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高 程

中美邻相对实力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零和博弈转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演变为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未来东亚秩序的走势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选择，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的大方向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努力构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地区秩序，将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这三个核心理念融入到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整套周边战略思路中。

关键词：二元格局 东亚秩序 中美互动关系 中国周边战略目标

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外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在昔日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形成中美二元格局。2009年之后，随着中美相对实力此消彼长速度的加快，东亚二元格局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导致世界权力中心的竞争从欧洲转移到东亚。^[1]在美国势力范围所覆盖的东亚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明显逆转。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东亚地区的利

高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 本文的初稿曾于2013年12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张蕴岭老师对本文做出的中肯评论和提出具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同时，感谢《国际经济评论》杂志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疏漏及不足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1] 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2, pp.21-31;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益格局如何在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基础上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决定着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势？中国在争取对自身和整个区域有利的地区秩序走势过程中，需要对周边战略进行怎样的调整和策略应对？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变化：中美二元格局由兼容到相斥

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是指在一定的国际关系构成中，由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联系、制约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它拥有两个维度，一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二是利益关系。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可以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周边格局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格局在性质上的变化。目前中国周边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在南亚和中亚美国势力影响较弱的地区，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较为温和，这些区域的利益格局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因此这两节本文将主要讨论21世纪以来中国周边的东亚格局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其中，我们围绕组成东亚格局的三条线索展开：一是中美两国和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实力对比变化，二是实力对比基础上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互动，三是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1]

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以美国军事和市场力量为主导的格局。在这一地区格局下，东亚内部以日本为生产链条的“雁首”，日本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友，辅助美国满足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实力迅速崛起，后者在东亚地区内部格局中，发展成为中心力量。^[2]这一时期，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利益诉求是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全

[1] 以下分析框架和研究详见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4~30页。在该文中，作者把地区秩序区分为“紧密合作秩序”、“松散合作秩序”、“无合作冲突”与“无合作秩序”四种类型。紧密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平衡，高水平供给可满足强需求；松散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位失衡，弱需求获得高水平供给；无合作冲突：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失衡，低水平供给无法满足强需求；无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位平衡，低水平供给满足弱需求。

[2] Ramkishan Rajan, “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 What Does It Imply for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8, No. 26, 2003, pp.2639-2643; Robert S.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球反恐，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主要是，分享中国和东亚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利益诉求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作为空间。直至2009年，东亚地区存在中美两个相互兼容并存的主导力量，其基本格局是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和谐并存。^[1]

在和谐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以互补和彼此兼容的方式满足了地区的公共利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高了东亚成员在经济领域的利益需求。东亚地区缺少内部完整的生产—销售市场，大多数成员同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中间环节，其经济运转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而非内部需求，因此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具有脆弱性依赖，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弱。东亚经济的脆弱性使其成员对于稳定的汇率、市场和相关合作机制、制度建设等公共利益需求程度增强。20世纪末以来，美国为东亚提供经济领域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自80年代后半期起，美国开始限制东亚的市场份额，以致东亚“雁型”模式生产链条前端地区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后端地区吞食。^[2]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坐视危机在东亚的蔓延。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萧条中，美国作为危机的根源，无意也无力帮助东亚经济体走出困境。与此同时，为了给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利益的意愿提升，并发展成为地区内部唯一有能力在经济领域提供主要公共产品的大国。一方面，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实质上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间的协同发展。^[3]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冲击提高了东亚地区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需求，其成员通过给予中国更多友善的回报提升了后者在经济合作领域为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利益的动力，^[4]东亚地区经济领域总体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合作局面。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区域内大国关系相对和谐，因此与经济领域不断增长的公共利益需求相比，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公共利益需求较弱。美国在东亚仅以较低成本投入便可维持该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美国作为外部力量，通过与区域内供给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美

[1] 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5~74页。关于亚太地区制度均势战略的讨论，具体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周小兵：“东亚经济结构的‘和谐’内涵及缺陷调整”，《当代亚太》，2007年第12期，第35~44页。

[3] 渡边利夫：《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东亚的回应》，倪月菊、赵英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4] 关于这段时期中国自愿、有意识地通过推动合作构造地区“共有利益”的过程，参见阮宗泽著：《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章。

国有意愿和能力为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且在供给能力上具有优势。中国有意愿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公共产品，且其供给能力上的优势不断提升。^[1]其表现形式是，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关系协调为东亚地区提供常规性安全保护和危机管理，^[2]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体来自贸易等领域的收益。^[3]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利益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以经促政”的战略，换取了周边国家对发展的善意和良好的周边政治安全环境，并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美国通过低成本维持着地区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并从东亚生产网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繁荣中分享经济收益。中美两国和东亚国家在正和博弈中实现了互利共赢。在东亚的力量格局中，中国面对的不是美国的安全联盟体系，而是利益兼容的中美、中日双边关系和与东盟之间相互促进的多边关系。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中美邻之间实力对比迅速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拉大。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中美邻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但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关系变化，使这种二元格局的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此前，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更多在于从地区经济繁荣中获益，特别是分享中国发展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壮大，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巩固和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地区霸权，以防止中国崛起成为东亚地区新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开始试图获得与自身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地区影响力。因此，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零和博弈变化。在不同的领域和议题上，中美之间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和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共存，但零和博弈上升为主导性规则。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竞争性和相斥性开始替代其互利性和兼容性。

[1]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2004/2005, pp.64-99.

[2]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不完全霸权与亚太安全秩序”，载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2006, pp. 153-159; 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48-70.

尽管美国和东亚诸国对中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但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力量格局中，中美各自力量及其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博弈关系，变为中国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美国依靠其地区军事联盟关系对东亚秩序的走向发挥作用；同时，经济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规则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1]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开始试图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利用其盟国力量，挑动其与中国的矛盾，推动并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安全体系。^[2]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3]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制衡可能导致地区力量格局的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

由于战略利益的变化，中美的互动关系在2009年之后出现重要调整，并由此影响东亚地区公共利益的供求关系。安全和经济领域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和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4]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引起了美国战略上的制衡。一方面，随着美国做出一系列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和东亚地区国家对中美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预期不断上升，对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引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5]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的对华战略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深化矛盾的方式，刺激部分东亚国家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产生更强的现实需求。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

[1] 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5~34页。

[2] 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1~7页；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1~107页。

[3] Richard Tanter, “The New American - 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 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 Containing China”, *Japan Focus*, March 17, 2007; 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50页。

[4]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5~25页。杨原也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机制是为区域内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32页；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

[5]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9, No.4, 2003, pp.269~271;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4, 2003, pp.315~3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 No.1, 2006, pp.35~55; 高原明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秩序”；金炳局：“夹在崛起的中国与霸权主义的美国之间：韩国的‘防范战略’”，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5期，第1~5页。

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被视为地区安全隐患。^[1]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断加强。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公共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东亚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区域公共利益的供给效率明显下降。^[2]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邻的战略博弈使地区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3]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地区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国力推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盟 10+X”合作框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规则。美国意图通过主导 TP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TPP 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减作用。^[4]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韩合作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平台，同时也是日本在 TPP 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的胶着局势下，东盟国家也试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中美在处理东亚地区公共事务上相斥程

[1] 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3, 2005, pp.414-436.

[2]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5-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4-32页。

[3]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4]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5-21页。

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1]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中美互动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美国这一域外因素影响下，地区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使未来东亚地区公共利益供求关系的三个核心变量——供给意愿、供给能力和需求存在较大变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冲突和相互协调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区域公共利益供给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状况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则东亚地区秩序形态有滑向冲突的风险。一旦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对华遏制战略令中国感到崛起成果难以守护，或其行为挑战到中国在领土主权等安全领域的底线，则中国或许不得不对抗性方式处理与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关系。^[2]整个地区可能由此被拖入更为频繁的冲突状态，对于区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随之上升到高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对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将表现为以减损对方权力和供给效用为目标的零和博弈策略手段，而难以真正满足地区在公共领域的高位需求。东亚地区将随之向低水平供给与强需求的高位失衡状态演化。

东亚地区是否能够维持和平秩序，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如果美国坚持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方向，则理论上中国单方面避免东亚地区向冲突转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令美国感到中国成长为地区霸权的威胁消失或明显缓解。如此一来，东亚地区可能恢复到2009年之前那种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补的供给模式基础上的二元松散合作秩序形态。这种地区秩序的演变方向符合美国和多数东亚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美国为东亚提供低成本的安全公共产品即可获得地区主导权，东亚成员则可以继续在经济和安全

[1] 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43页（或 Gao Cheng, “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2011）；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第127~139页。

领域分别从中国和美国身上获益。^[1]但是,这种状态不具有稳定性。中国为东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动力在于,通过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方式获得发展空间,或者借此缓解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如若偏离自身发展这一终极目标,或者其实力和影响力的消减令美国放弃对其施压,则中国很可能失去对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因此,这种建立在内在战略逻辑矛盾基础上的东亚秩序演变方向不可能长期维持。^[2]

如果中美一方在竞争中形成明显优势,获得稳定的地区单一主导权,并替代原有供给机制,独自为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则东亚地区会向单极松散合作秩序形态演化。作为东亚区域外强国,为了巩固合法性,由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最终会是一种将其自身纳入其中的、具有新地域范围及涵义的地区秩序。正如当前美国在东亚地区所采用的策略那样,它正在重新界定和塑造地理边界和地区身份认同,力图在概念上用“亚太”地区和“环太平洋”地区合作秩序替代东亚秩序,进而将地区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主导权进行整合,改变地区目前的二元格局。然而,随着相对实力的衰落,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制约下,特别是在其内部民主制度约束和利益集团压力之下,美国独立扮演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满足地区公共利益的总体意愿和能力均呈现下降趋势。^[3]尽管美国不断高调重申“重返亚洲”的决心,但是通过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过程中其对外政策和国内反响来看,美国未来在东亚独立承担安全和经济领域公共产品所带来的财政负担难以在国内获得政治认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受制于国内社会不断上升的“孤立主义”情绪,其在对外事务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财政支出状况的约束。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采取低政治对抗性、低成本投入的战略阻止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美国在东亚的博弈筹码和优势战略资源,其一在于军事领域对盟友的影响力及其东亚国家对其安全保护的需求,其二在于通过主导地区规则控制贸易、金融等多边交易渠道的能力。如果美国未来单极主导东亚,将基于以上博弈筹码做出长期战略部署。针对军事和联盟体系的优势资源,美国将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多运用“离岸平衡”战略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其中重点是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

[1] 东亚国家的理想策略参见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2008, pp.113-157.

[2] 关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在目标和策略上的逻辑矛盾和内在冲突,可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5-26页。

[3] 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贸领域相互消耗，并从中获利。对此，美国会努力维持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长期化，通过操纵这一矛盾以较小的成本巩固在东亚安全领域的主导权。除了安全领域，美国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在于，它在该地区拥有高达24%份额的最终产品消费市场，^[1]可以通过最终产品消费市场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对东亚生产分工网络具有控制能力。因此，美国在东亚将投入更多关注和资源重构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网络和经济合作议题，力图通过新的排他性地区多边机制，把中国阻挡在规则体系之外，或在时机成熟时将中国约束在对其不利的规则体系之内，进而通过改变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和游戏规则，边缘化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其中TPP将作为美国单边主导亚太地区经济规则，与中国竞争经济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平台。^[2]

中国在竞争中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单一主导力量，需要的前提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由于内外部负担而难以维系，世界格局重新回归地区主义。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进一步取代美国、欧洲和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最终消费产品市场，实现从区域内外经济枢纽向地区内部经济命脉的角色转换。对此中国积极的战略目标应为，通过更多吸收东亚成员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能力来帮助扩大整个地区的内需水平，使东亚逐渐发展成为内部相互依赖、对外相对自立的产业链，并由此将东亚市场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结构转化为地区政治影响力。其二是缓解自身崛起给东亚地区多数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认知，至少要将这种认知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避免由不确定性导致想象空间的无限扩大。只有当地区安全问题不再敏感和突出时，建立在传统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联系性权力在东亚地区权力格局中的权重才能下降，以经济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权力才能更多转化为地区影响力，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主要来源才能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3]

以中国为单一主导力量的东亚秩序能否在未来演变为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紧密合作形态，关键在于区域公共利益的需求和供给机制是否能够内生。只有当东亚地区公共领域的内部挑战足够强劲并具有持续性，以致整个地区对高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http://www.iadb.org/intal/intalcdi/PE/2011/07384.pdf>, p.3.

[2]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81~97页。

[3] 按照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定义，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它决定着世界经济体制，而世界经济体制又体现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水平合作的需求长期维持在高位上，东亚成员才会在权力让渡方面做出更多妥协，使地区形态向紧密合作秩序演变成为可能。欧洲紧密合作秩序和地区主义模式是基于内部安全公共产品需求所催生的“欧洲共同体”供给模式。东亚地区因内部公共需求不足，总体上不具备形成类似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东亚共同体建设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东亚”身份认同对成员的吸引力和“东亚”与其他身份认同竞争的程度。^[1]而东亚地区主义的成长一直深受外部力量干扰，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制约，共同体认同相对脆弱。如果未来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帮助东亚国家一同应对和解决地区增长瓶颈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公共问题，并在构建内生合作秩序过程中凝聚“东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则东亚共同体和地区紧密合作关系的建立并非全无可能。但是，这对于中国和内部合作根基松散的东亚地区而言任重道远。

由中国单边主导的东亚松散合作秩序还有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由于松散合作秩序是一种区域公共利益供求失衡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在外外部竞争压力缓解后，中国可能会由于缺少必要的回报而逐渐丧失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动力，以致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趋势向各自为政的无合作秩序形态回归。中国所面对的地区内部利益诉求在于，大多数东亚成员国不仅期待通过合作平台解决地区公共需求，而且希望建立相互约束的合作关系，集体抑制中国主导权的建立和运用。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它们一方面力图效仿欧盟，将避免形成一国独大局面的目标内化到合作机制和规则之中，另一方面格外强调突出国家主权至上，抵制和质疑任何形式的超主权国家机构和力量。^[2]东亚多数国家谋求的是大国承担主要公共责任的同时利益平等分配这样一种投入和收益不对称的合作模式。中国未来需要考虑，在外外部竞争压力减小的状态下，战略上是否选择为一个回报消极的东亚地区持续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以维持松散的地区合作关系。如何抉择将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地区秩序观和全球战略考量。目前为止，迅速跃升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地区秩序观，和以东亚区域为依托的世界秩序观，而是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短期利益密切关联的具体外部问题上。但是，作为不断上升的地区主要力量，东亚秩序的演变方向和身处其中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将是中国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

[1] 周方银：“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56-62页。

[2] 仇发华：“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第52-67页。

新地区格局下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调整

在中美之间竞争与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首先需要避免导致地区秩序陷入冲突的常态中，这也是中美邻三方的共识。在此前提下，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近一年来，新一届政府在周边做出的外交策略调整总体是成功的，开始扭转自2009年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被动局面。具体体现为：基本打破周边国家对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的预期和相应的机会主义动机；促进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无领土争端的盟国之间的中立化趋势；对美国、日本、菲律宾基本实现由被动转向战略主动；提高了与周边大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战略互信。在逆转周边困局的过程中，“经略周边”的理念被提出，这是向一个以我为主的周边秩序方向努力的积极信号。从防御性角度看，经略周边是为防止中国外围形成国家间进攻性联盟遏制中国长期发展、降低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从积极主动角度看，经略周边旨在塑造对中国长期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于在该地区寻求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

周边格局变化和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目标，使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座谈会规模超乎预期，凸显了周边战略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面对周边格局和环境的变化，中国周边战略大方向正在进行重要调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中国对周边的态度从以被动应对危机和麻烦为主，开始转变为将该地区作为中美全球博弈的地缘依托地带进行主动塑造和经营。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出台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相互配合，中央地方双层互动的整套周边战略规划。其二，中国周边外交正在面临从立足“韬光养晦”向全面有所作为的转型。伴随中国外交转型，中国需要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例如：对外政策是否仍然压倒性地服务于经济利益？是否仍然刻意回避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对“不结盟”的外交原则是否需要做出更为灵活的解释或调整？美国是否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与别国及地区关系是否继续让位于维护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为邻国提供安全保护承诺的状态是否仍会持续？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针对这些问题或许会给出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外交答卷。其三，大国外交的内涵正在发生由客体到主体的变化，从中国对大国的外交，转

变为中国是大国、以中国为主与其他大国的外交。新型大国关系从以中美关系为主，全面扩展到以中俄、中印、中欧关系并重。其四，中国正在实现由外部世界认知中的“被崛起”到主动寻求“崛起”的转型过程，将提出冲击现有国际体系观念的地区秩序理念及话语主张，争取在周边国际社会获得更多共鸣和具有相似发展诉求的战略伙伴。其中主要表现为力主塑造一个由强调互利共赢上升到基于身份认同、含有明显地区色彩的东亚“命运共同体”。

基于周边战略环境的变化和积极主动经略周边的外交思路转型，中国首先需要对外明确自己在周边的战略目标和秩序主张，以便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进一步确定实现目标的战略手段。周边战略目标的设定首先需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从实现可能性上讲，它需要被大多数周边国家接纳，最好能获得共鸣。在新的地区格局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5-10年周边战略的核心是要构建有助于区域国家共同发展的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认为地区秩序未来方向充满不确定性，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以不同形式的矛盾体现出来。中国需要直面这些疑虑和矛盾，通过塑造互利共赢的地区秩序为自身和平崛起赢得有利的周边环境。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由于相对实力变化带来的竞争和矛盾不可避免，在短期内难以化解。但是对于大多数周边国家来说，中国有能力通过主动作为，更多发挥中国崛起的积极因素，缓解负外部性带给周边的威胁感，为自己赢得更宽松的崛起空间。

中国需要通过明确周边战略的调整目标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崛起的诉求。这一诉求的核心是使国内民众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以及在外外部世界获得与承担责任相称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寻求的地区秩序是将自身发展和民族复兴与周边国家的长期利益相互融合。只有这样才能让周边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期许超过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的短期不适感。中国官方已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1]按照笔者理解，“命运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分享共同利益，面对与解决共同威胁和危机，建构身份认同。根据以上三层涵义构造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地区秩序，中国可提出三个核心理念：谋求共同发展，促进开放竞争，强调相互包容。这些理念具体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国周边战略的调整目标可做如下概括。

第一，倡议地区国家间政治权利平等，防止美日两国在周边发动遏制中国和

[1]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0月24日，http://www.gov.cn/ldhd/2013-10/25/content_2515764.htm。

平崛起的政治联盟。中国崛起和周边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能够合理体现各自诉求的宽松的地区政治环境。在目前中美竞争、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国在周边需要长期面对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其特点不同于传统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在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美国的不对称体系，其成员不具备根据自身利益灵活调整结盟关系的能力。^[1]尽管中国外交“不结盟”原则迟早将做出灵活性调整，但中国在周边建立一个与美国相互竞争的联盟体系在中期内不现实。因此，中国对周边政治环境的营造首先需要建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当前主流国际规范基础上。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地区秩序，既不利于中国影响力的发挥，同时也将有益于周边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因此在政治领域，中国需要努力倡议一套比美国单边霸权秩序更具有道德合法性和吸引力的秩序理念。其中主要内容可包括，地区各国无论大小强弱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在地区治理方面均具有提议权和发言权，并通过协商方式共同解决地区公共利益问题。

在倡议区域各国政治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同时要努力寻求开放性的地区政治秩序，明确反对美国联合日本等周边国家合力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美国在中国周边主导的政治、军事联盟体系带有明显的制衡中国意图。这种集团化的地区政治生态既给中国和平崛起制造了较大的压力和阻力，也不符合周边国家谋求长期发展的利益诉求。由大国主导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化不但历史上曾给亚洲和平带来重创，而且在现实中它使地区步入政治对抗关系的风险增加，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压力上升的重要原因。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都在努力寻求自身发展，并不希望卷入大国间的政治集团竞争，尤其不愿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此，中国可借此在周边努力营造去集团化或弱集团化的政治环境，争取以平等基础上的地区政治协商机制逐渐取代目前美国霸权体制下的集团政治生态。

第二，在安全领域发挥大国协调作用，建立以中美为主的地区公共安全机制。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的共同愿望和保障。中国周边地区在美国重返亚太和大国竞争背景下，对安全保护的需求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大国权势转移的过程中，不确定的安全隐患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的共同障碍。同时，由于存在海洋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难题，因此建立避免国家间冲突失控的安全协调机制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符合地区所有国家的基本利益。中美地区战略目标虽然分歧比较

[1] 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1~48页。

大，但双方都需要相对稳定的地区发展环境，共识之一是避免地区冲突陷入不可控状态，之二是尽可能降低由于政治对抗导致的经济损失。

中国及周边地区主要由三类国家组成：一是以中国为代表，具有独立军事防御能力且对周边邻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安全自助型大国；二是美国军事联盟体系中不具备安全自助能力的被保护国；三是不从属于美国军事联盟体系，但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1]中国周边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其中多数国家军事实力较弱，在安全领域不具备自助能力。相比而言，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具有更强的实力和协调能力。东亚地区的安全议题和保障责任一直由美国单边主导，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局面。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美国财政负担能力的下降，中国以合作和建设性姿态介入周边安全领域的可行性上升。为提高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应当更多参与地区安全事务，担负起地区安全保障的责任，为维护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处理地区安全议题上，中国要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地区安全协调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同时与美国分享相应的权力。在地区安全领域，中国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形成以中美为主的大国协调机制，共同发挥彼此对于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和约束力，降低由于突发事件或国家间冲突给整个地区带来的安全威胁，避免地区陷入军事竞争的“安全困境”。

第三，促进开放、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开放、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不但对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而且符合多数周边国家的利益，容易获得它们的共鸣。中国周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区，大多数国家同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位置，与发达国家市场的关联度高，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和冲击的能力较弱，特别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期，受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伤害较大。因此，中国需要为自身经济崛起和周边多数国家的长期增长争取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此外，中国与周边多数国家共同面临可持续增长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中国有能力通过对周边提供更为广阔和开放的市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并由此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期待值。

促进开放、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也是当前中国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围剿”的有效策略。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生产者集团的竞争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通过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

[1] 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1~48页。

伴关系协定”(TTIP) 重构并主导全球和地区经济规则, 试图巩固消费者国家集团对市场定价权的控制。在金融、国际分工、高新技术等核心领域, 美国重构的全球和地区经济规则网络开始由多元开放和鼓励参与转为有条件准入, 通过 TPP 和 TTIP 等“俱乐部式”的地区多边机制, 把中国等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排斥在规则体系之外。^[1] 针对此, 中国在经济领域应团结多数周边国家, 促进共同参与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 同时在现有地区和全球经济规则的边际上寻求合理的增量改革, 使这些经济制度安排能够更公平地体现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度。与此同时, 中国需要在周边更多整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 促进开放、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机制, 有效利用美国重塑地区规则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群体矛盾, 缓解美日等发达国家集团限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效力。

第四, 改变粗放经济外交模式, 以主动作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从中国崛起进程中切实分享福利, 缓解中国崛起的地区威胁认知。2009年之后, 中国在周边基于互利共赢原则的“以经促政”战略效率下降。在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大背景下, 中国有必要调整“以经促政”战略的粗放性实现方式, 超越以往单纯的经贸互利共赢和各取所需, 积极主动地推行惠及周边政策, 争取让更多国家的国民利益与中国崛起的方向一致。除了通过继续开放, 让周边国家分享来自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收益, 惠及周边的思路可在如下领域拓展。

首先, 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最终消费品市场。中国目前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多体现为进口对方的初级产品和原料, 未来中国需要更多消化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 鼓励其制造业发展。其次, 不仅要体现在总量意义上, 更要落实在微观层次上。近年来, 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 但总量贡献的效果往往并不直观, 开采资源和破坏环境给民众带来的微观感受却是直接的。因此, 未来惠及周边的措施需要更多战略性考虑, 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单纯追求利润的行为, 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形象, 使来自中国投资的切实利益深入对方国家民间社会层面, 真正让周边国家的企业、民众获得实惠, 以降低中国崛起带给周边中立国家的“生理”不适感, 从而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再次, 要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中国需要区分与周边国家政治趋冷是源于难以逆转的长期结构性矛盾, 还是中短期可以调整和改进的情绪性问题。与之相应, 根据

[1] 高程: “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12期, 第81~97页。

周边国家不同的友好程度和态度，中国需要制定一套错落有致的惠及周边方案。最后，在多边层次上，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可通过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安全 and 经济公共产品，使周边国家分享到中国国力强大带给地区的公共福利。当然，其前提是获得与公共贡献相称的地区大国地位。

第五，推动地区发展理念的多样化，使中国发展模式被更多周边国家理解和接受。宽容、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有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协调。中国和周边国家在社会文化领域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东亚国家曾深受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近代西方条约体系和战后美国推动的社会民主化浪潮的影响，构成多重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相互交织并存的社会。南亚和中亚地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制度特点。而如何将自身社会文化和制度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互协调，多数国家都仍处于探索过程中。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要努力缔造一个相互包容和尊重彼此观念分歧的区域国际社会，倡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理念的多样化，使地区国家尽可能排除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差异等干扰因素，将注意力集中放在与本国发展、地区合作和区域共同进步切实相关的议题上。

诠释中国发展模式，使之被多数周边国家所理解，是缔造周边和谐社会的关键。基于自身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特色，中国一直努力在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框架下摸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尽管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这种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绩效。与此同时，它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异己”发展模式而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等标签，成为抹黑中国和制造“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针对此，中国要以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被更多周边国家接受。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移植的所谓西方制度和模式不能使这些国家突破社会经济增长瓶颈。在如何将自身文化、制度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互协调问题上，多数中国周边国家仍处于探索过程中。中国可以更为积极地宣传自己的发展模式，将其中经验与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或面临共同难题的周边国家分享，帮助这些国家亲身体会到中国发展模式的现实合理性。与此同时，为回应“中国威胁论”的舆论造势，中国还要结合自身发展模式的优势，提出真正代表本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主张，在观念上冲击美国试图联合西方发达国家集团重构的多边秩序。

第六，中国周边地区不仅是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与中国之间的博弈，在美国力量主要覆盖的东亚地区，中国需要特别把握与己关系相对友好或中立的力量。如果策略得当，中国可以做到使尽可能多的周边国采取中立，而不是追随美国制衡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展。面对中国崛起，周边国家的利益诉求、利益排序和对待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度存在差异，它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各有不同。中国需要进一步细化与这些国家不同性质的关系，进而采取差异性的外交策略应对。即便美国的军事盟友亦不应等同视之。比如泰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就相当温和，^[1]韩国也并不积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印度尼西亚具有一定规模和地区影响力，不希望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分化东亚合作框架，更不会轻易倒向美国，是中国可以团结的对象。马来西亚、泰国更看重中国经济增长带给地区的福利，对待中国崛起态度相对温和，也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友好力量，至少是中立力量。老挝和柬埔寨是与中国有传统友好关系的国家，应进一步通过次区域合作巩固与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在周边推行差异化策略的原则应是，对中国的友好程度与该 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与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疏离程度相一致。确立该原则的目的在于消除一些周边国家试图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向中国施压，以此从中国身上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幻想，尤其要防止部分国家通过制造事端对中国的“求稳”心态进行利益敲诈的企图。通过差异性的外交策略来处理与周边国家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双边关系，同时有选择性地推动小多边或次区域合作，将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在东亚多边层次面临的困境。

以中美互动为主导的中国周边格局主要体现在东亚，这也是中国周边战略布局的重点地区。与此同时，在中亚和南亚这两大美国力量辐射能力较弱的周边地带，已分别形成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中心的地缘生态。随着这两个大国的介入和关注，多极化力量正在中国周边地区角逐。俄罗斯希望借助中国崛起实现自身复兴。中俄两国之间的利益基础和发展逻辑，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促进了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进。^[2]未来深入和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东北亚、中亚安全领域的合作都将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起到反制作用。作为南亚近邻，印度看待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心态，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同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在争取国际组织话语权上具有共同利益。中国可充分通过金砖合作机制这一突破口，在南亚与印度和谐共处，并且争取其在东亚重要问题上保持中立。总之，身处正在转型的周边复杂环境中，中国要以战略视角争取友好力量、利用多方矛盾，为自己争取下一个十年的周边战略机遇期。■

[1] 孙学峰、徐勇：“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1997-2012）”，《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80-96页。

[2] 王树春、万青松：“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4-22页。